■ 文化世家

二十七年浮沉郎署，四壁萧然犹是晏如，官微言轻不以为念。他将毕生精力注入到经籍著述中，和妻子王照圆精于考据朴学。“一家两先生”“栖霞郝夫妻”传为佳话。

郝懿行：此生恬淡唯著书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本报通讯员 王强 蒋言芳

在烟台栖霞城北的北七里庄外，有一座毫不起眼的坟墓。它南北临河，东依山岭，西系平地，平凡而无奇。坟墓外表，没有奢靡华丽的人工雕饰，只有几块质朴无华的天然石块。

可坟墓下安葬的，却是清代大儒、著名学者郝懿行。他一生的仕隐行迹，冥冥中恰巧和陵寝的质朴相契合。“郝懿行42岁中举，做了多年的主事小官，从未因升官托过关系。他虽然清贫穷苦，但毕生勤奋笃学，博涉经籍，著述宏富，去世时留下满屋图书和手稿。”郝氏后人郝庆光说。

汇集了郝懿行毕生学术心血的《郝懿行集》 鲍青 摄

逆天改命不如安心读书

郝庆光是郝懿行的六世孙。他热爱乡土文化，如今正忙着编修《郝氏家谱》。而郝懿行，无疑是郝氏一族中光芒最为耀眼的辰星。

郝氏一族，原籍河北枣强。明初大移民，郝氏先祖和千千万万的无名百姓一起，踏上了背井离乡、开拓新土的道路。他们先迁居莱州府，后又西迁到不远的栖霞城内。

郝氏在栖霞站稳脚跟后，人丁滋繁，趋向兴旺。到郝懿行曾祖父郝倬时，耕读之风渐盛，家族成员的足迹也开始突破山丘，迈出乡土。

郝倬为布衣时，以“好义乐施、孝顺双亲”知名于乡。成年后，又因品学优异，被当地推荐到京师国子监读书。朝廷岁考国子监贡生，他被定为“优等”，选补为同知。同知是一州最高长官知府的佐官，分管督粮、捕盗、防汛、水利等杂事，事无巨细，颇为繁琐。郝倬上任后，讲求廉洁自守，于民便利，颇有佳声。但他对仕途不甚挂念，所以早早辞官归乡。归隐期间，手不释卷，爱读史籍和医书，还曾汇编成《医方便览》一书。

郝懿行的祖父光宏，是乡间的秀才。懿行之父培元，自幼酷爱读书。私塾放课后，他步行前往舅父家继续求学，无论隆寒盛暑，从未中断过。后来他成为贡生，选为训导，负责地方教育工作。

郝培元读书刻苦，教子也非常严厉。乾隆三十一年（公元1766年）腊月底，年幼的郝懿行，遵父命在室内温习功课。也许是天寒地冻，又或许新春将至，郝懿行始终心猿意马，东张西望，不甚认真。休息间隙，郝培元拿起《毛诗》问：“我抽查其中篇目，你能背诵吗？”郝懿行道：“父亲可以随便抽取，儿子定能熟背无误。”郝培元就抽了几首诗，郝懿行却忘字漏词，几乎一句也对不上来。父亲见状，怒其不奋，重重责打了他。一旁的母亲见爱子受屈，只是含泪啜泣，却不敢言语。

数日后，母亲将怒气化作揶揄，嘲讽郝培元：“普天之下不喜欢儿子的，恐怕也就只有你了吧。”郝培元喟然长叹：“恐怕天下疼爱儿子的，也是和我相似的吧。乡间谚语常说‘鞭打快牛’。牛快了为何还要加鞭？就是希望它能增长气力，多耕多收啊。”

父母之爱子，为之计深远。郝培元常对儿子怒目而视，表面威严，内心却极为柔软，对郝懿行一直另眼相待。他有一次对人说：“我的长子懿行，性情颇类我，与书亲近。我不愿中断他的作为，变得嬉游怠惰，所以督促非常严厉。”他曾与儿子闲谈，偶及命运浮沉的话题。郝懿行答：“命运不可强求，若不能实现固执的期望，往往悔之晚矣。不如安心读书，新奇之书能赏心悦目，义理之书可养心修身。不用奔走劳形，不用忧戚用心。如果能面对无尽藏书，醉心六经道学，不也是无上乐趣吗？这和执着茫茫前途，一生争夺而不能得相比，究竟孰得孰失呢？”

小小年纪发此言论，让郝培元大为赞叹和惊喜。他从此不再以“亲老在堂、家贫应仕”为由，来干涉阻挠郝懿行的志向。

郝懿行表露的初心，好似命运初照，贯穿他一生始终。“先祖后来虽中进士，但做官恬淡寡欲，从不走关系，恐怕也是少年天性所致吧。”郝庆光说。

无意科考可怜心为形役

自身的聪敏好学，父亲的严厉督促，让郝懿行早早在乡党间打响了名声。19岁时，他入县学读书，成绩总是名列前茅。

郝懿行不愿为科考所累，但日益困窘的家境，让他必须正视现实，被迫“心为形役”。郝家原本殷实，但累世敦厚，对人毫无提防，以致败落清贫。

乾隆四十三年，郝懿行成为廪生，享受官府生活补贴。当年山东学政赵佑视察烟台，见郝懿行的诗文，将其誉为“栖霞四杰”之一。乾隆五十一年，郝懿行经举荐入国子监读书。

成为廪生，接下来就要尝试参与乡试，博取功名。郝懿行碍于时俗束缚，也留意作些科举时文。但他虽研习时文，习科举业，内心却依旧排斥鄙夷，独爱经籍研究。他觉得：“（山）东省教授子弟的，向来没有什么章法。数十篇陈腐朽烂的时文，也会被奉为传家衣钵。”他认为，治学根基在于经史，“不攻经史诸书，非治学之道”。读书当遵循欧阳修，自七八岁开始研读经籍，十五六年便能默然在胸。此时稍微运用读书余绪，也能作出锦绣文章来。

乾隆四十三年，21岁的郝懿行第一次赴考乡试。归来不久，长女郝桂降临人间。初为人父的郝懿行，兴奋、惊喜，还带有一丝紧张，百感交集。他特意为女儿取名“桂”，暗合乡试“桂榜”之意。可惜乡试出榜时，他却名落孙山。在为第一位亡妻林氏所作的《祭亡室林氏文》中，郝懿行对这种悲喜交加的复杂心境，依旧记忆犹新：“既归三载，诞生一女，我适秋试，归而晤语。女名曰桂，佳兆攸系，讵我命蹇，依然下第。”

未成想，此后噩运竟然接二连三。两年后，岳母染病弃世，妻子林氏因伤心过度，患上恶疾，以致瘦骨嶙峋，汤药不离口。28岁时，次子毓麟降生，算是多舛命运的一大慰藉，可十二日后婴儿就不幸夭折。林氏身体本就羸弱，又遭丧子打击，疾病渐趋不治。两年后，林氏离世，郝懿行悲愤中作《悼亡诗》三十首，寄托哀思。

从初次落第到妻子病故，郝懿行一直闷闷不乐，未曾再赴科考。

乾隆五十二年，丧偶的郝懿行经人介绍，与同乡王照圆结为伉俪。是年，王照圆24岁，郝懿行30岁。在妻子的勉励下，他重新鼓起勇气，加入仕途科考。

完婚次年，郝懿行参加山东乡试。也许是新婚燕尔的喜悦，郝懿行这次如愿考取举人。妻子王照圆在应试之初，写诗勉励夫君，期望他一鸣惊人，“如君折得蟾宫桂，自尔高山听鹿鸣”。

当下部分研究者认为，郝懿行因无意仕途，考中举人后，一直迟迟不去礼部会试。但考察郝懿行生平行迹，其实中举后第二年，他便赶赴京师春闱，但名落孙山。次年是乾隆帝八十寿辰，朝廷特别开恩科，郝懿行又一次来到京师，依旧铩羽而归。

不久，岳母和母亲相继亡故，郝懿行居乡守孝，料理后事，未能应考。39岁时，郝懿行又一次上京赴考，仍然落魄归来。

“先祖郝懿行对科举虽不是很挂心。但每次有科考，只要家中没有变故，总是参加的。这也许是时俗对士子的束缚，也许是家境的考量，让他不能完全超然仕途。”郝庆光说。

到了嘉庆四年（公元1799年），郝懿行已逾不惑。当年正月，太上皇乾隆病故，权臣和珅被嘉庆赐死，朝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当年春，郝懿行再度从故乡出发来到京师，寓居在宣武门外的山左会馆。今年会试与以往有所不同，嘉庆帝派出了“老少组合”来主持考试。主考官是68岁的帝师朱珪。他为官清正，在扳倒和珅上贡献颇大，深得嘉庆帝信赖。副主考则是刚刚35岁的户部左侍郎阮元。阮元曾和郝懿行一道参加乾隆五十四年的科考，郝懿行名落孙山，阮元金榜题名。当年进士召对时，乾隆对年轻的阮元大为喜爱，高兴地说：“不意朕八旬外复得一人。”此后阮元仕途扶摇直上，如今已成了二品大员。

旧帝新殁，新帝初临，朝政似乎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嘉庆帝踌躇满志，想要变革朝纲，网罗人才，自然对此届科考极为重视。朱珪与阮元虽然年龄相差悬殊，但认识颇为一致。二人皆有感于以往考试过于看重义理，以致所选人才皆无实学。他们决定加大策论比重，“以得其实”，考察举子们对典籍的理解和掌握能力。

此次会试，搜罗了大量人才，如著名经学家王引之、金石学家周中孚，精通天文星算的罗士琳，还有擅长考据的郝懿行，“一时名流搜拔殆尽，为士林宗仰者数十年”。

当年的考友，如今成了自己的座师。不知郝懿行拜望比自己年轻7岁的阮元时，究竟会有怎样的感触。

舍弃仕途选择回归著书

由于清朝官僚队伍臃肿庞大，郝懿行虽中进士，却长期得不到实缺可补，仅在户部挂了一个江南司主事的虚职。江南司职掌核销江宁、江苏、安徽三布政使司的钱粮，及江宁、苏州两织造的奏销案，兼管各省动支平余银两及地丁逾限等事。他所任的主事，则是江南司最基层的官吏。

因为“自守廉介”，性情恬淡，郝懿行从未想过要为仕途去拜拜同乡、走走关系，所以二十余年“淹抑户曹，未迁一官”。他还赋诗自娱道：“作吏廿年仍晏如，久应归去屡踟蹰。贫难供给非关客，懒爱萧闲却著书。开卷羲皇人以上，登堂亲旧话如初。不知许事休轻说，日报平安乐有余。”

此生的精力，郝懿行舍弃官场，选择学术。在他心中，累次科举赶考，仅是例行公事，为的是报答双亲、谋取俸禄。

例如中进士后，郝懿行在给父亲家信中言道：“因家贫而亲老，所以才不加以抉择就出仕为官。人子侍奉双亲，能够得到皇家升斗之资，博父母膝下之欢，已是非常快乐了。”第二年七月，他又写信给弟弟：“老亲在堂，尚属康健，所以我才能稍事游宦。但至多五六载后，就要思虑归养之事了。”

当年十一月，父亲郝培元病逝，郝懿行和妻子归里服丧。三年守孝期满，他回京继续担任闲职。也许因浸淫诗书许久，郝懿行变得朴讷少言，完全没有清廷官员的圆滑模样。时人胡培翚记载，郝懿行品性耿介，性格内敛，为人恂恂谦退，讷若不出口。他不肯轻易与人交谈，如果不是素知的老友，经常相对终日不发一言。只有谈论经义时，才喋喋不休忘却疲倦。

郝懿行在京为官，如同隐居一般，所好只是读书，“寡交俭出……性嗜学，精训诂，牙籤万卷，终日铅黄不离手”。他展篇执笔，往往夜过四五更也不中断，废寝忘食，手不释卷。

郝懿行官微言轻，俸禄微薄，不执着于敛财置业。二十余年的俸禄，除了勉强用于生活开支，几乎全用来购置典籍。因为入不敷出，所以生活清苦，“所居四壁萧然，庭院蓬蒿常满，童仆不备”。郝懿行常披一件弊羊裘御寒，冬日诵经不辍。有时为了买到心爱之书，不惜“典却御寒之衣”。二十七年浮沉郎署，他处之晏如，“视官之荣悴，若无与于己者”。

直到嘉庆二十五年，63岁的郝懿行才奉旨补缺为“钦点户部福建司主事”。可惜五年后他即病故，在官场几乎毫无作为。

著述宏富益彰琴瑟和鸣

在北京做官，郝懿行所做之事，几乎全是著书。

郝懿行能泰然著书，不挂心仕途，除了天性使然，也和贤妻相助分不开。妻子王照圆醉心经史，与郝懿行琴瑟和鸣。二人相处，绝非索然无趣，平日生活常有诗词唱和的甜蜜。

二人新婚时，郝懿行已过三旬，却时常有小情郎的甜蜜感溢出。他和王照圆“挑灯闲话”时所作的《催庄（结婚过彩礼）》《却扇（新娘出嫁蒙头遮面）》二首，以及《关关雎鸠》等诗，皆是情意绵绵，富有情趣之作。

诗中，王照圆以细腻笔触，描绘了幸福满满的新妇形象。她“预知偕老期”，认定两人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。《桃始华》里，王照圆用一系列柔软细腻而又清丽的意象，勾勒一幅春光初现的美好景象，极写柔情无限，暗喻婚姻生活的美满甜蜜。她的《却扇》更是直抒胸臆，将对郝懿行的爱慕表露无遗：“千里良缘丝线牵，三冬榖旦结团圆。挑灯最喜亲风雅，先说周南第一篇。”《诗经·周南》第一篇，即是歌颂少男少女相恋的情诗《关雎》。郝懿行作和诗，也极言自己的幸福，他以“双燕齐飞、双星齐现”来衬托二人结合，更以“梦灯频结彩，早定百年期”来表明快乐。

这样的郝懿行，和外人眼中木讷呆板的形象截然不同。

也许最温柔的那一面，注定要留给最爱的人。有了琴瑟和鸣的甜美爱情，郝懿行的学术成就日益精进。正如鲁东大学翟如潜所言：“夫妻唱和不仅是表现生活中的情趣，也表达了各自的感情，而且还是激励学业不断精进的动力。”

同时代的好友，对郝氏夫妻的感情也有所记载。如臧庸说：“时有父子著述，一家两先生，王石渠观察及令嗣曼卿学士也；有夫妻著述，一家两先生，郝兰皋户部及德配王婉佺安人也。”

“父子著述”，就是同时代的高邮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，他们亲承戴震“皖派”嫡传，精于训诂小学；“夫妻著述”，便是郝懿行、王照圆夫妇，两人精于考据朴学而知名。臧庸将“高邮王父子，栖霞郝夫妻”并举，足见郝懿行与王照圆亦师亦友的关系。

王照圆幼喜《诗经》，早年曾著《葩经小记》，后因母亲过世而搁置。后在郝懿行“考订篇章，日月浸寻，著述等身”的影响下，重新寻得旧稿，补葺成书。王照圆校正《列仙传》时，郝懿行亲赴京都白云观为她抄录藏本。郝懿行的研究，也注入了王照圆的心血。《清史稿》载：“照圆文辞高旷，得六朝人遗意，懿行有所述作，照圆每为写定题识。”

从嘉庆十三年至道光二年（公元1822年），郝懿行一直忙于《尔雅》注释。王照圆与他一同参证异同得失。郝懿行十分尊重妻子的质疑和意见，“间取照圆说”。张澍记载，自己曾拜会郝懿行，嫂夫人王照圆便以《尔雅》疑事来发问，他只能勉强酬答而已。

学术上，二人相持相扶，生活中同样举案齐眉。郝懿行中进士后，王照圆便赴京城照顾。她早年对丈夫仕途有所期待，但旋即和丈夫共同耕耘学术天地。郝懿行浮沉郎署二十七年，书满其室却贫病交加，晚年境遇凄凉。王照圆一直陪在身边，相濡以沫，同甘共苦。郝懿行以“早知谙女诫，挽鹿谢殷勤”，来表达对爱妻共受贫困的感激。

王照圆与郝懿行共生三男一女，但仅有一子长成。郝懿行作《幼子文虎哀辞》疾呼：“呜呼！寿儿竟不寿耶？”哀叹“儿遗诗书，我不忍观，藏之故箧，亦不忍残。哀儿幼慧，夺我彭年”。母亲王照圆，丧子之痛更是不可言说。

早年的“执子之手”，晚年的“与子偕老”，历经风雨的感情，愈发显得醇厚芬芳。

郝懿行晚年贫病交加，学术研究却毫不懈怠，王照圆陪伴左右，悉心照料。郝懿行曾自述：“治经之难，漏下四鼓四十年，常与老妻焚香对坐，参正异同得失，论不合辄反目不止。”二人治学艰难可见一斑，二人感情弥笃也可见一斑。

清白离世唯留鸿篇巨著

道光五年（公元1825年），郝懿行卒于京邸。除了丰富的著述，满屋的书稿外，别无长物。遗孀王照圆处境极为艰难，“欲归里，无资粮；无居业，羁居京邸，未知所依”。郝懿行的同乡好友牟庭，见此情形生出无限感慨，他凄凄然道：“古曰：‘金满籯不如遗一经’，今日抱书编，不如一囊钱。平生但信古人言，哭死方知事不然。不可生无书，那可死无钱。呜呼，古人一瞑百不见，长使今人泪如霰。”是年五月，三子云鹄将郝懿行的灵柩运回故里，葬于先茔故地。王照圆归里后，深居简出，专心整理丈夫遗著，以期能彰显于世。

郝懿行留给家人的，没有享之不尽的物质财富；留给世人的，是近400卷的鸿篇巨著。

郝懿行的代表作《尔雅义疏》，历经14载寒暑修订完成，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。《尔雅义疏》对中国古代第一部词书《尔雅》详加辨析，援引考据，疏通证明，校正讹谬，博得同时代经学大家阮元、王念孙等人的赞誉。

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，曾在日本发起成立“国学讲习会”，专门讲解《尔雅义疏》等国学名著。

郝懿行的另一名著《山海经笺疏》，也以“精而不凿，博尔不烂”广受赞誉。《山海经》成书于战国，经秦汉陆续增删，记载了各地山川、物产、风俗，保存了远古神话和历史地理资料。自东汉以来，虽有学者为此书作注，但研究最深的还是郝懿行。他在前人基础上，广征博引，正名辨物，刊正疏谬，作了许多补正。时人江藩称之为“实事求是之学”。阮元在《刻山海经笺疏序》评论称：“郝氏究心是经，加以笺疏，精而不凿，博而不烂。”张之洞在《书目答问》中，将该书列于《山海经》读本之首。

光绪年间，《尔雅义疏》《山海经笺疏》等郝氏遗著，由淄川人毕东河进奉朝廷。因各书“精博邃密，足资考证”，皇帝审阅后降旨由翰林院保存留览。

郝懿行去世60年后，其孙郝联薇完成《郝氏遗书》刊板印行。他在刊书中赋诗云：“不置田园刊祖书，关心亲族笑我愚。岂知版籍传家远，胜遗膏腴万顷余。”

“郝联薇这首诗，既是对自己心意的坦露，也是对郝懿行毕生行迹的总结。”郝庆光说。

栖霞郝懿行墓 郝庆光 摄

相关阅读·

身兼封疆大吏和学界领袖，他积极调和“汉学”“宋学”之争，力求兼采二者，倡导实学。在他的鼓励和推动下，学界风气发生可喜的变化，并为后来经世思潮兴起，准备了条件。

阮元：调和“汉宋”开新风

□ 本报记者 鲍 青

郝懿行于嘉庆四年考中进士，当时的副主考是清代名臣阮元。阮元曾和郝懿行共同参加过乾隆五十四年的会试。与郝懿行留心著述、仕途不显不同，阮元在仕途和学术上皆有重大成就。他依靠自身才华和权势地位，深深影响了一代学风。在他的鼓励和推动下，嘉、道两朝渐渐形成注重通经致用的风气，为晚清经世思潮高涨打下了基础。

阮元少年早达，历任学政、巡抚、总督，晚年更是进京拜相。他为官五十载，清正廉明，又学问渊博，著述宏富，在政界和学界都极有威望。他早年受顾炎武、戴震学术思想影响，对清廷八股取士就有不满。等到他出仕为官后，更是重视文教，崇尚实学。历官所至，“必以兴学教士为急”，门生遍天下。

阮元任山东、浙江学政期间，对科举考试内容进行改革。科举考试不再考《四书》死记硬背的呆板知识，而是“借题发挥”，考察学子对经术教士、治学以及取士等问题的理解，以考察他们的应变能力。

阮元在督学鲁、浙两省时，提拔了严杰、洪颐煊、端木国瑚、陈文述等一批实学人才。嘉庆四年，阮元任会试副主考。在考试之前，他把自己对科举改革的理解，详细汇报给了刚刚真正掌权的皇帝。阮元在奏折中说：“校数千人之文艺，必当求士之正者，以收国家得人之效。欲求正士，唯以正求之而已。”他提出了“先器识而后文艺”的人才选拔原则，强调“求士者，唯在乎求有学之文”，主张录取具备经世济民真才实学的人。在这篇奏疏中，阮元未曾提及如何完善八股程式，却委婉地提出了改革科举内容的建议。嘉庆帝默许了阮元的意见。阮元和朱珪，在会试中连出策问数十题，内容皆和实学相关。如察吏安民之法、军政弭盗之方，这些问题都需通过考证引古论今，表述意见，才能让文章站得住脚。

这次会试，阮元共录取王引之、张惠言、郝懿行、陈寿祺等209人。一时名流，网罗无遗，对树立新学风产生重要影响。

要改变学界颓风，创建新式书院是当务之急。阮元任浙江巡抚第二年，即在杭州建诂经精舍，选录诸生读书于其中。阮元推行他的文教改革思想，完全排除时文帖括，教授“经史疑义，旁及小学、天部、地理、算法、词章等”。由名师主讲、出题，再由学生自由研究。

嘉庆二十五年，阮元又在广州开办学海堂，对自己的教育思想作了进一步发展提升。

阮元倡导的兼采“汉宋”、倡导实学的学术新风，得到了当时著名学者如焦循、凌廷堪等人的认同和呼应。焦循对汉学崇尚考据、盲从汉儒的态度，以及排斥宋学的门户之见提出批评：“近之学者，无端立一考据之名，群起而趋之。所据者汉儒，而汉儒中所据者又唯郑、许。执一害道，莫此为甚。”他又说：“朱子之徒，以道学为门户，尽弃古学，非也。近世考据之家，唯汉儒是师，宋之说经，弃之如粪土，亦非也。”凌廷堪则指出，惠栋、戴震等人“谐声诂字必求旧音，援传释经必寻古义，盖彬彬乎有两汉之风焉。浮慕之者，袭其名而忘其实，得其似而遗其真”。

清末著名学者刘师培盛赞阮元、焦循等人“调和汉宋”是“力持学术之平，不主门户之见”，为后学做学问树立了典范。徐世昌《清儒学案小传》则说：“（自阮元后）道、咸以来，儒者多知义理、考据二者不可偏废，于是兼综汉宋者不乏其人。”阮元的门生，道光间广东学者陈澧在学海堂肄业后，任职学海堂数十年，晚年主讲菊坡精舍，一直贯彻阮元汉宋兼采的学术主张。

阮元倡导的质疑问难学术风气，改变了岭南专尊八股的沉闷空气和士人沉浸心性之学的空虚风尚，对后来改良思想和学说出现，起到了一定的影响。梁启超盛赞阮元：“广东近百年的学风，由他一手开出。”他在《三十自述》中说：“（某）十五岁，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，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，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。至是乃决弃帖括以从事于此，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，更有所谓学也。”由此可见，梁氏早年深受阮元实学思想和改革思想的影响。而这也为晚清实学兴起和科举改良乃至存废之争，奠定了思想基础。